

山田辰雄先生访谈录

世界中国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被访者：山田辰雄先生（广播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采访者：盐出浩和（城西国际大学专职讲师）

日期：2007年1月23日下午2:00~6:00

地点：东京三田庆应义塾大学亚洲研究所第二共用研究室

提问：您是怎样开始中国研究的？

山田：我的大学时代是从20世纪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就读的是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法律专业。最初是对中国的古代历史，如丝绸之路的历史感兴趣。而法学部政治学专业中有涉及现代中国的政治课。当时恰逢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我的老师石川忠雄先生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等书籍出版，便对现代中国逐渐产生了兴趣。于是，大学二年级时我从法学系法律专业转到了政治专业。

这一转变，既有我个人的志向因素，也有社会状况的影响。因为当时正处于冷战时代，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较今日尖锐得多，这也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中国研究状况持批评态度。身为学生，我能自由地接触双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自己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便产生了不受社会或学界潮流的影响，开拓自己的中国研究之路的想法。当时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缘何能够取得胜利方面。为此，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研究很时兴。在现代中国研究方面，庆应义塾既有历史传承，也有很多资料。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石川忠雄先生的“中国政治史”课，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课，主要讲解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史。此外，除政治史之外，我还从政治专业与中国政治史相关的国际关系、日中关系、东南亚的政治、历史等领域的授课中得到启发。有时我还到文学系听中国文学课，去经济学系听中国经济课，我自由地选择了这些科目，因而扩大了对现代中国的兴趣。

以上是学校的课程情况。此外，各系关心现代中国的学生自主创立了“中国研究会”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阅读有关现代中国的书籍，开展各种讨论活动。其间，我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和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当时学生运动盛行，这个小组也不免受政治影响。因此，有人参加了反对安保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也有人没有参加。确切地说，我们共同认为，在尊重各自政治信念的情况下，应保存开展研究的共同场所。举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例子：当白天有游行活动，一部分同学前往参加后，没有前去的同学便会直到深夜一等待参加的学生回来。我曾有过在日吉的教室等待参加游行示威学生回来后，一起阅读毛泽东著作的经历。这是能够反应庆应义塾的学问和政治方面状况的美好记忆，迄今仍然印在我的脑海中。这里曾培养出数位中国研究学者。我认为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良好时期庆应义塾的风气。

在学生时代开始区域政治研究时，伴有外语课程。我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学习英语，考大学也看英语，因而借助字典可以阅读，但还要学中文。在当时的大学外语中，中文的地位并不高。我当时在法学系，而法学系里没有中文班。因此，我要到文学系的中文班进行入门学习。当时受到了村松暎等中文老师的极大关照。在三、四学年，我参加了庆应外语专科学校——庆应义塾外语学校的中文课讲座。该课程周期为两年，初级我是自学，中级和高级听课，并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该中文课程的学习。虽然这些知识仍显不足，但学完该课程后，

终于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中文的书籍、杂志及报纸了。这便是我作为中国专家，最初学习中文的经历。

以上便是我大学时代接触中国研究的经过。

提问：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研究会的情况。研究会是跨系的组织，各系学生的关注点与方向性是否有所不同？是否有特殊的活动呢？

山田：没有分化成文学系的学生搞文学方面的活动，经济学系的学生搞经济方面的活动等现象。大家都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每个人的政治方向性却有所不同。不过，大家都愿意在一起阅读毛泽东选集。这是一个具有追求超越系概念的共同立场，对政治感兴趣却不受其左右进行研究和学习的中国研究会组织。后来，研究会会员中既即出现了学者、专家，也出现了记者、政治家，我想研究会的方式对他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时正值讲政治的年代，在这一背景下，我决心今后将恪守学问、学习、研究的独立性。这就是庆应精神。我认为这就是庆应的传统，或说是其研究、教育的方式方法。

提问：接下来是语言问题。当时法学系没有中文课，您是在文学系和庆应义塾外国语学校学习中文的，请问授课老师是台湾人还是来自大陆的老师？

山田：与现在不同，没有直接来自大陆的老师。虽然如此，我并不清楚（他们）是否来自台湾。比如说，东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师中有一位陈东海老师。此外，庆应义塾外国语学校里有一位发音清楚的北京人女老师水世常。在庆应，我师从的是村松暎老师、藤田祐贤老师及其他的年轻老师。我是在文学系和庆应义塾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汉语。

提问：在法学系不能学习中文，是否学习了德语或法语？

山田：我学习了法语，但法语学得不是很好。我认为学习中文，对自己从事中国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或许是受惠于此，我曾于1989年在巴黎的EHESS（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事过为期约一个月的授课，并与法国研究人员相处得非常愉快。因为当时除英语外，我还使用了一些中文。因为在研究人员之间，中文属于通用语言。我还和法国的中国研究者进行了广泛交流，譬如，白吉尔、巴斯蒂、毕仰高等人都属于我的前辈，我同他们或在研究方面，或是作为朋友进行了交流。

提问：当时在学生们中间，大家对中国的关心程度如何？

山田：与今天完全不同。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非常少。当我说自己“在从事中国研究”时，大家的反应就会十分强烈：“为什么会从事中国研究？”由于处于政治年代，如果所从事的是有关中国的研究，许多学生就会误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当时学生们在找工作等场合，没有谁会说“自己在研究中国问题”。所幸的是，我恰巧没有到企业工作，而是到大学就职，所以没有遇到相关的问题。由于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所以对中国感兴趣的同学非常有限。用今天的话说，这属于“冒险事业”。正是由于人们不感兴趣，我才认为这一事业有前途，开始关心起来。我认为不是因为中国事物有趣，而是因为从这些有趣中挖掘出其学问方面的意义，这才是重要的。

提问：您在大学时代的学习过程中，除中文老师外，有没有其他带给你较大影响的老师呢？

山田：前面已经讲过，我的指导教师石川忠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老师的“中国政治史”课名气很大，而且，老师还曾出版过优秀著作《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本著作在当时的日本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属于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我从三年级时进入石川先生的研究会，此后，从学生时代至今一直受到老师各方面的指导。这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

另一个是中国研究会的田中明先生，他当时任经济系助教。田中先生原是日本思想史的专家，但他对中国问题兴趣浓厚。年轻时曾任中国研究会的辅导老师，我曾受到田中先生的悉心指导。因此，在中国问题、做学问的方法、研究态度方面，我受益匪浅。

提问：从系研究会到研究生院学习期间，您是如何选择研究课题的呢？请介绍一下情况。

山田：我大学时代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孙文的研究。说是孙文研究，主要还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研究。提交给系里的论文是1919年以后孙文的政治领导及其思想。进入研究生院后，在自己的硕士课程里，我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问题很感兴趣。此后我对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一些人，如与孙文关系密切的廖仲恺、汪精卫、进入过武汉政府的左派领导人以及其后的国民党改组问题等尤为兴趣浓厚，并以论文《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获得庆应义塾的博士学位。这是我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所从事的研究。

谈到为何选择这一研究课题，其中有很多理由。在日本的国民党研究领域，孙文研究最为流行，但有关其后的国民党发展状况的研究在二战之后几乎没有进展。我认为仅对孙文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孙文还是对国民党，都无法真正了解。因此，我想到从那些被看作与孙文关系紧密的国民党左派们其后的政治路线的发展，即其后国民党的发展中重新认识孙文。出于这个考虑，我从孙文出发开始研究国民党左派。

当时共产党研究非常盛行。即使在石川先生的研究会里，对国民党感兴趣的也只我一人而已。这并不是由于大家都不研究自己才决定研究，而是考虑到仅对共产党进行研究是无法了解中国的。由于1949年之前，政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所以自己决定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立及相互作用方面去了解中国现代史及中国革命。我并非主张不需要对共产党进行研究。所幸的是，由于自己身边有许多从事共产党研究的学者，所以有机会接触有关共产党的精辟论述。在此基础上，为了重新构筑中国现代史，我选择了国民党研究。

其实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国民党左派也有意义。所谓国民党左派，是指走蒋介石的国民党及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中间路线的一些人。研究国民党左派，就会发现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及毛泽东的共产党相同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对这一集团进行研究，具有从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作用中理解现代中国的意义。我的研究不是仅对国民党左派这一小集团进行研究，是基于这样做可以更好地理解整个中国革命才选择这一课题的。

或许是巧合。有意思的是，在庆应大学里，我的导师石川先生是一位共产党史研究专家，石川先生的导师川及恒忠先生则从事过国民党研究；我之后的高桥伸夫先生从事的也是共产党的研究。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由于庆应的结构宽松自由，即使从事与自己导师不同的研究，也可以在学校有一席之地。这是庆应历史传承或曰传统。

此后有很多学生参加我的研究会，其中有不少毕业生成了研究者，我从不干涉他们的研究课题，学生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课题。如果按照教师的指导改变课题，将有可能导致学生失去研究的积极性。我不但自己这样做，也让学生们珍惜自己所选的课题。这些做法都是基于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其间，1966至1968年，我以研究生院学生的身份前往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所幸的是，当时我已经就任庆应义塾大学的助教，所以留学生活相对比较轻松。当时曾出现过“研

究中国为什么要去美国”的质疑声音。虽然一些人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我自己则没有这样的狭隘想法。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司空见惯，但我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盛行，而且能够比在日本国内学到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于是，出于边从事中国研究，边学习社会科学知识的想法，我前往了美国。

当时。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采用的是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联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发展论和比较政治论非常盛行。我在学生时期学习了上述的相关理论，但却未能使之顺利融入我的中国研究之中。究其原因，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及比较政治论中暗含着欧美社会是最先进的社会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远远地观察中国、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倾向。与其理论本身相比，我没有接受他们这些理论基础中的潜意识。由于我没打算批判地领会美国的学问，也就顺其自然地学习过来，我认为理论基础中的无意识的内容在社会科学中非常重要。学还是要学习，同时也要有所舍弃。

美国的政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很广阔，帕森斯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虽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学习，但在自己的学生时代，阅读过帕森斯的著作，对他为美国的政治学及社会学带来何种影响产生了一些兴趣。帕森斯受欧洲社会学的影响。我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欧洲社会学，但也注意到例如帕森斯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论述过马克斯·韦伯，他在解释韦伯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与我的理解不吻合。

韦伯的确论述过新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儒教、道教的著作一并阅读。我在学生时代读过这些著作。韦伯阐述的理论虽然颇为宏大，但其理论背后存在的潜意识是什么则是个问题。将其对儒教、道教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会发现，显然，他认为欧洲的宗教与新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对资本主义及现代化没有作用。这一意识构成了他的理论基础。如此一来，他对儒教与道教的理解便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消极层面。我认为这一点不正常。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我是从这样的观点分析韦伯的。

我虽然不知道儒教对后来亚洲经济的发展起到过多大作用，但从经济发展层面分析，儒教显然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有必要对韦伯的理论进行重新解读。我认为，以韦伯社会学为源流之一的美国社会学大家的帕森斯等人与我们是否从根本上就有了错误呢？我并不打算否定韦伯，只是希望对他的认识要相对化。

我从自己学生时代学到的知识分析日本的社会科学状况后感到，阐述韦伯的人很多，但没人注意到韦伯潜意识中的问题。若进一步从广义方面分析，这一点是近代日本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过程中的缺欠。

我曾批判过这种社会科学，因而在中国研究中没有无条件地接受现代化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尽管我留学美国并学习了美国的社会科学，但未必促进我的中国研究。我的研究的起点——力求挖掘包括孙文及毛泽东等人在内的中国革命思想的特性，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一构想与今日的中国研究看法一致。因此，我至今仍对宇野重昭等先生提出的中国内部发展论抱有兴趣。

提问：接下来，想问一下欧美的社会科学与您的研究之间的关系。请您再介绍一下美国留学的时间。

山田：我是1966年至1968年在美国留学，主要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时期，我尤为关注CCAS的活动。CCAS即“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这是一个与越南战争相关，忧虑亚洲的美国研究者组织。1966年至1968年，刚好是美国开始意识到越南战争困难性的时期。亚洲研究者对越战非常敏感。

此前的中国及共产主义研究，由于处在冷战环境下，骨子里存在着“了解敌人”思想。

但人们也意识到了从“了解敌人”的思维出发给研究带来的错误认识。于是，研究人员逐渐将焦点转向中国的权力斗争及路线的差异方面。但是，那里有真实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一直在那里生活。因而，应当更加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情况。

此前我有过美国第一主义的想法，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想把美国的一切都学到手补充自己。但看过中国后，对共产主义的好恶姑且不论，我认为中国有其自身的价值及体制。“担心亚洲的学者”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美国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中国同样也有自身的生活方式。学术界出现了将美国相对化的趋向。

这一思潮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结束。其后，美国的政治氛围因尼克松和里根的出现而趋于保守。于是，这一思潮随之终止。最近，在全球化名义之下，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人权等声音越来越强大，试图把全世界纳入欧美社会经历过的轨道。美国若抱着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走出国门，注定要失败，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他们应当学习亚洲的经验。

早期美国曾介入中国的内战，更大规模的是越南战争，距今最近则是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就是因为美国有这样的思想。在留学时代我就意识到，这与美国现代化理论及比较政治理论根基中的某种意识有关。

出于这种思考，我从一开始就是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亚洲问题学者通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及改版后的《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的读者，直到今天仍在订阅。如今这种思想在美国已不是很强大了。或许是由于明白了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问题上未能取得顺利进展，美国本身也被迫出现了相对化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对此变化最敏感的并不是美国的欧洲研究人员，而是我们同行的亚洲研究人员。也许我们没必要认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那种思潮会卷土重来，但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这种思潮出现的时期或许会来临，或许不会来临。

提问：在您留学的时候，成为美国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将实现现代化的欧美社会视为所有社会的目标。您对中国与之相比有多大的差距，应如何实现现代化等争论的评价或不同看法，是否构成了您其后研究立场的基础呢？

山田：是的，我对那些观点进行了反驳。我并不否认传统社会的现代化。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个人的解放、政治的民主化、经济增长，或社会合理化分工、民族独立和统一等。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会伴有各种现象，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性。

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处理现代化问题时的优先顺序是不同的。孙文在其《三民主义》中有句名言，其大概意思是说，中国需要的是国家的自由，绝非个人的自由。若以此断定孙文主张压制人权是错误的。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试图步入现代化时是把国家放在优先地位的。而在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中，也有某种路线，认为要必须经过一些阶段。譬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便可视为这一观点的典型的代表。

提问：那么，通过美国留学，您确立了研究中华民国史，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意义？

山田：是在批判美国学术观点的过程中，同时深入了对国民党的研究。因而，这不属于单纯的批判，而是要寻找能够取而代之的学术观点。如今人们开始关注中华民国史了，而我向日本学术界提出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在美国留学之后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历史被片面化，我称之为革命历史观。当时的历史无论是编写还是评价，都是以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为基础。我批评过这种革命史观，认为单凭革命史观是无法理解中国的。

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无论对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其他政治势力，都应该尽量相对化，要首先处理好自身的问题，然后再从相互的关系中，重新构建中国的近代史。如此追根溯源，便会回到国民党研究这一原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对共产党的研究。这一点不能误解。

提问：您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一书于 1980 年出版。当时的日本学界是如何看待这一著作的，其影响如何？换言之，请您就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当时的学界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谈一谈。

山田：20 世纪 70 年代，我从事左派的研究，1979 年获得庆应义塾的学位，1980 年在《庆应通信》上发表。实际上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那之前，我的导师石川忠雄先生看过我的研究论文后便建议说“应该考虑出版”，并给我提出了客观的指导意见，得到了鼓励，取得学位，形成书。然而，该书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其间，当时东京大学的卫藤沈吉先生专门在《亚洲研究》上撰写书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在石川先生和卫藤先生等老前辈的关照下步入学界，并于 20 世纪 80 年开始被人们所关注。

应该是在 1980 年前后，各大学的志趣相同的人士汇聚一堂，成立了民国史研究会。当时，研究民国史的人并不多，大学里充其量也就有那么一两个人。这三、四十人聚集在一处，每年举办三、四次集会。由于这一研究会是自己倡议的，于是便出任了首任研究会主任。后来，我认为自己长期负责下去不是很合适，便在第三年或是第四年的第十次会议之后，推举了横山宏章先生担任主任。横山先生在明治学院大学，现在在北九州大学任教授。

横山先生才华横溢。与我任主任时期相比，将民国史的研究大大推进了。横山先生之后，由东京大学的石井明先生接任。研究会大约在举办了二十五次左右后解散。但我认为，研究会的解散绝不是坏事，反而应该视为好事。由于研究会成员们回到自己所在的大学后，继续开展研究活动，使得民国史的研究渗透到了年轻人阶层。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国民党研究及民国史研究的势头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史研究。这种情形持续到现在。

这一动向与日本的情况同时也与国际学界的状况有关。在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有关国民党及军阀的研究成果，我在留学时期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尤其是作为我的私人朋友、学界的前辈，陈志让、易劳逸教授对我十分关心，给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他们是民国史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者。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正值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时期。因此，虽然中国在学术领域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相应的限制，但还是不断盛行开来。因此，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扩大。

当然，台湾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很早就很盛行了。较近一段时期，日本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台湾的研究。虽然有些自夸的嫌疑，我认为自己是日本学界最早接触台湾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最初是 1967 年在美国遇见的台湾国民党系的研究人员李云汉和蒋永敬两位先生。恰好他们正在作武汉政府时期的研究，与我的研究课题较为接近，于是便拜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建立了融洽的个人关系。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如今，我仍在与他们的台湾下一代研究人员进行着交流。从这一意义上讲，台湾的研究对我的民国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与今天相比，台湾当时的研究受到极强的政治影响。从另一角度讲，这和大陆的革命史观完全相同，属于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革命史观。我对这种倾向的研究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同时与台湾的学界一直保持往来。

如今，这样的政治束缚已日渐松懈。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的研究环境已经得到了改善。如今我对蒋介石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此前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对蒋介石的评价截然

不同，如今我同双方的学者都在进行着交流，他们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巨大了。

我在推进民国史研究过程中，力图扩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至今我仍然认为，仅从这一方面了解中国是不够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受到 1989 年政治风波的影响，我提出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如果扩展了民国史研究的范围，连续性问题就涉及到纵的方面，即从过去、现在与未来，或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联中理解中国，对中国的理解必须包括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我认为，这对分析将来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基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研究中国政治史时，无论分析对象如何，在历史和现代这一形式上，最好不用 1949 年划分中国的历史，而应在两者的关系中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

而无论是在横的扩展方面还是在纵的扩展方面，我最近都在思考一个有些抽象的问题，即关联性问题。我曾经说过，在政治史中，研究某一政治运动不能仅分析其本身，而要置于与各种势力、状况的互相作用中分析。譬如，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中，人们把焦点放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运动上。但事件的走向最终还是取决于党、政府、军队和学生、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这次政治风波的分析，必须从对立双方的关系中进行。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我的国民党左派研究是从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方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分析中国政治的发展的。基于这一观点，我在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中，力图从与国民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与共产党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为左派定位。尤其是在对承袭左派路线的改组派的研究中，这一观点更为明确。

虽然该研究尚未完成，但我希望将这一观点运用到整个中国政治史研究中，看看会产生怎样的与以往不同的历史面貌。

提问：再对前面的话题进行一些补充。在民国史研究会创立之初，除山田先生和横山先生之外，还有哪些主要成员呢？

山田：有东京大学的石井明、中央大学的姬田光义以及宇野重昭先生等前辈。虽然负责研究会运营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但也曾向宇野先生咨询，并得到许多建议。还有稍年长于我的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和电气通信大学的藤井升三先生。当然，也有一些比我年轻的人参加。

提问：在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征求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吗？

山田：没有。但在聚会时，多数人认为“不能跟从文革时期的革命史观，因其过于片面”。

提问：大家都认为需要研究中华民国史吗？

山田：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从视角上讲，大家也都认为用过于僵硬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是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

提问：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反对革命史观？

山田：已经形成共识。但这并不是单纯的批判，正如刚才所言，采取的是在相互关系中，或是将政治势力相对化中理解中国的积极态度。这是与今日中国所说的中华民国史的不同之处。

虽然中国对各种政治势力的评价正在逐渐趋于相对化，但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相对化水

准。这里存在着日中学术交流中理论方面的问题。为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作为民国史研究会的后续组织，如今久保亨等人创设了“民国史论之会”。

提问：日本学界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方面存在一些争议。例如将辛亥革命定位于何种性质的革命，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应该重视以1949年为历史交替时期，还是应该重视其历史的连续性的论争等。请您就自己在这些论争中的立场及发挥的作用谈一谈。

山田：的确出现过很多争论。最大的争论点是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乡绅革命。在日本，市古宙三先生等人很早以前便提出乡绅革命论。在中国，基本上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及台湾，虽然难以用二分法划分，但整体上乡绅革命说占主流。我本人则坚持认为属于资产阶级革命。

这里包括两点，一点是看谁领导了辛亥革命问题。我认为，虽然乡绅阶层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是孙文等革命派人士。另一点是看革命后所形成的政治体制。辛亥革命虽然寿命较短，但毕竟形成了议会制民主主义。基于这些，我认为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

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民国史研究会的争论很激烈。具体情况是，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坚持一贯的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他们通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对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以及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中央大学的研究人员则认为这是一场恢复主权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除此之外，中国近代史里也出现了许多争议。关于1949年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国内对新中国的诞生反应强烈，对社会主义中国给予极高的评价。即使文革时期，也被视作新型社会主义的出现。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转变。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开始认为，1949年在政治史方面的确非常重要，但从其他领域方面看则有衔接前后的连续性。如政治领导与政治构造问题。我虽然主要研究政治史，但也重视经济及文化方面的连续性。与其以1949年为分界线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莫如从其连续与终止两方面进行分析，尤其从其连续性方面进行分析，更有利于理解中国。这一观点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识。日本的学术界也经常举办一些关于中国的连续性问题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我认为，中国连续性的研究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的共同课题。

提问：日本学术界是如何开展活动的？此外，请介绍一下庆应义塾区域研究中心的活动情况。

山田：在日本，与我所研究的现代中国问题相关的大型学会主要有两处，分别是亚洲政经学会和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亚洲政经学会是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同时也兼对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进行研究的全国性的学会。学会以政治、经济为主，其中也包含了历史、文化及社会等领域。该学会成立于战后，有近60年间的历史。另一个学会是日本现代中国学会。这是从事现代中国诸问题研究的学会，重点研究中国的大型学会。这一学会与前者大约同期设立。两者都在积极开展着研究活动。我同时身为双方的会员。

在中国研究被极端政治化时期，与此相伴，两个学会之间也产生了政治上的对立。具体而言，亚洲政经学会属于稳健的一方。在文革时期，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里站在中国立场上的人多一些。但基于学会自身的性质，并没有表现出严重的排他性，可以像我这样，同时加入两个学会，自由参加活动。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与亚洲政经学会关系更紧密一些，因为自己从年轻时便参与其中了。距今十多年前，我担任了该学会的理事长。当时恰逢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时至今日，仍不失为全国性的学会。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东方学会。那是一个从古代至近代、从东亚至西亚的大型学会，从世界规模上说，与过去叫“东洋学者会议”（Orientalist Congress），现在称为“ICNAS”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是该学会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我在那里也参加了许多活动。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学会。

日本学会的运作方式不像中国的社会科学院或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那样，以政府资金为主开展研究。因此，日本举办国内或国际性学术会议时，并非以学会为单位，而是由个人或研究小组共同创立各种项目开展交流活动。在日本学术界，各大学或研究课题相近的研究人员聚集一处，设立许多小型的研究组织开展研究活动。例如，日本女子大学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及庆应义塾的区域研究中心等一直发挥着中国研究的组织作用。庆应义塾的区域研究中心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但在 8 年前改名为东亚研究所。虽然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但基本的运营方式却没有发生变化。

区域研究中心是庆应义塾为纪念义塾创办 125 周年而设立的研究所。我担任第一任副所长 4 年，然后又担任所长 6 年。在中心做过很多工作，基本上是组织研究项目，开展集体研究。参加者不仅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时也会有理工科及医学方面的教师参加。例如，曾经开展过交通系统问题及环境问题的研究。

按照中心的规定，研究成果必须汇编成一册出版。为此提供出版补助成了中心的特点之一。这些研究项目不仅有庆应人员参加，也有许多非庆应人员参加。每个研究项目大约持续 2 至 3 年，庆应之外的参加人员作为研究员可享受自由使用图书馆等特殊待遇。因而可以和各大学及研究所的人员进行交流。

研究中心主办国际会议，平素则有数名学者访问，一些年长的研究者作为客座研究员自由参加研究活动，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研究所规模不大，但灵活性强，肩负着国内或国际联络机构的作用，在推动庆应义塾的亚洲研究以及区域研究方面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提问：接下来想请您谈谈学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及自己在国外的活动。

山田：首先从自己的个人经历谈起。在研究生期间我曾留学美国，所以最初的国际交流活动是与欧美学者之间开展的研究交流。我前往美国那年 28 岁，正在攻读博士课程，那时已担任法学系的助教，因此美方为我提供了学生和研究人员各半的待遇。正如方才所讲，当时我与易劳逸、陈志让等优秀老师们成为朋友。

此外，美国国土广袤，我与很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过交流，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及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期间，我的导师是迈克尔·加斯特教授，后来他调任拉特格斯大学任教授。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成果颇丰。

若列举名字就太多了，如最近去世的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魏斐德教授。此外，叶文心教授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已故学者，从事现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奥森伯格教授和施坚雅教授等。再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教授与我的研究范围相同，是著名国共合作时期研究学者。年长于我，从事毛泽东研究的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学者。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如今与人合作，从事着中日战争的研究。我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半年，当时受到了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的悉心关照。麦克·奥克森伯格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在他去世前一年，我曾应邀到斯坦福大学进行讲演。遗憾的是，他已经患病在床。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离开了学术界的朋友，例如对四川省进行了很有趣研究的罗伯特·卡普、对湖南省进行过研究的安格斯·麦克唐纳等人都曾是庆应的访问学者，我与他们有过良好的日常交往。然而，他们中途退出了学术界。我迄今仍与罗伯特·卡普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遗憾的是，安格斯·麦克唐纳先生已经辞别了人世。

由于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在美国度过的，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自己曾潜心研读，虽然周末也曾经外出游玩，但周一至周五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平素一旦有所懈怠，便会回想起自己的留学年代，这已经成为自己今天的巨大动力。

美国留学两年后回到日本。在归国途中，花了3个月的时间到美国和欧洲旅行，欣赏了那里的绘画和音乐。当时的旅行给我的思维方式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例如，抵达欧洲美术馆后，在参观西洋美术发展史时，心中萌生了“历史是如何发展至今的”这样一种历史观，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

1968年9月我独自一人访问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的还是比较早的。其后，我与苏联学界进行了断断续续的交流。承蒙对方的抬爱，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了我名誉博士称号。虽然最近没有去俄罗斯访问，但我与他们之间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

我还与法国及东德的研究人员进行着交流活动。这种情形或许并不多见。东德解体之前，洪堡大学有一位知名教授，名叫费尔巴。通过这人，我与欧洲尤其东德研究人员的交流比别人多。

尤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84年在位于意大利贝拉吉奥的洛克菲勒别墅里，我与20多名欧洲学者一道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为“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欧洲的优秀研究人员这次相会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财产。威尼斯有一所大学名叫威尼斯大学（Ca'Foscari Venezia），我最近与该大学的萨马拉尼先生交流频繁。威尼斯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我曾经去过多次。

以上介绍的是与美国及欧洲的交流情况。在亚洲，我最早进行交流活动的地方是台湾。台湾有前面提到的李云汉先生、蒋永敬先生的晚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留学日本的林明德、黄福庆两位先生，如今他们已然退休，接下来就是他们的下一代张玉法先生。下一代人中有很多人，毕业于庆应义塾的黄自进先生积极开展同日本的交流活动。我至今还与同近代史研究所的前所长陈三井先生及吕芳上先生进行交流。

台湾和大陆曾经有过极端政治化时期。因此，想同时与双方交流并非易事。我有自己的原则。对方有其相应的立场，因此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在所难免。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研究者，我首先是尊重对方。其次，前往台湾时不讲大陆的坏话，到了大陆不讲台湾的坏话。我至今仍在与大陆和台湾双方的学者进行着交流。我们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关系。

韩国的学者也非常热衷中国研究。但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曾有过不能从事中国大陆研究的时期。其中，优秀学者中有已故的首尔大学的闵斗基先生，他的研究和人品都非常出色。此外，还有一位与我同代的延世大学研究中国和国际政治的学者，我们至今关系依然很好。现在，接受过闵斗基先生指导的学生们在主持韩国的中国政治史研究。

中国大陆地域辽阔，研究者众多，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无疑非常重要。我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不算太早。初次访问中国是在1977年。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举行，我也应邀参加。这成为我其后与中国大陆之间交流的契机。

那时，我与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李宗一先生相识。他在袁世凯研究领域非常有名。他的论文是关于辛亥革命立宪派，我对此进行了点评。这便是我们最初的交流。此后，与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日渐频繁。

1983年，我作为日本大使馆的专业调查员到北京赴任。当时，中国方面对大使馆的专业调查员十分警惕，几乎没人愿意与我交往。所幸的是我认识李宗一先生，作为学者，我有前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的机会。

从1985年左右，中国开始举办有关孙文及中华民国史的全国乃至国际会议。由于是我的专业领域，所以积极参加了这些会议，了解了中国的研究动向，结交了一些朋友。在孙文研究领域，结识了广州的中山大学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多位先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庆应义塾邀请了李宗一先生。后来，如今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王

晓秋先生年轻时也来庆应义塾工作一年。此外，还有许多通过庆应义塾与中国进行的交流活动。如今，日中历史合作研究项目的中方委员 10 人中，有 4 人曾到访过庆应。

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也有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开展交流活动的有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的南京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及其他的机构。各方面关系都较为紧密的是天津的南开大学。

广州的中山大学有陈锡琪先生、段云章先生、林家宥先生，广东社会科学院有张磊先生、黄彦先生。此外还有很多。与复旦大学的姜义华、黄美真两位学者关系紧密。无论在学问上还是个人关系上，与南京大学的张宪文先生都相处得很好。在北京大学，除王晓秋先生外，还有其后调入该校的茅海建先生、在南开大学，研究日本问题的俞辛焯先生给我很多关照。接下来，在交流中留有较深印象的还有日本研究院院长杨栋梁先生、副院长宋志勇先生及老前辈魏宏运先生，已故的王永祥先生。以上这些人只是我与之交往的一小部分人而已。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除与张海鹏先生、杨天石先生等密切交往之外，还有许多前途广阔年轻人。

谈到国际交流，日本人往往会认为是前往海外参加活动。但从今日日本经济地位方面分析，我认为接受国外邀请，其实更应该多邀请国外族学者前来日本。从国际交流的观点看，日本学者这方面的努力尚显不足。并非我一人在做这些努力，我曾与卫藤沈吉先生等一起组办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如 1991 年在夏威夷举办的辛亥革命 80 周年纪念会议，1997 年在庆应义塾举办的日中关系学术研讨会，1999 年在庆应举办的有关日中关系中的军事史的会议。

2000 年至 2006 年有 3 次抗日战争的国际合作研究，哈佛大学的傅高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天石、早稻田大学的平野健一郎先生等许多人都参加了这 3 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第 3 次会议是 2006 年 11 月在箱根举行的。

上面提到的是几个常常令我回忆的几个会议，此外，平时还有许多中小型国际会议。我曾在区域研究中心主办过多次会议，大多会议是与日本学术界的各位同仁合作的。也和神戸孙文研究会的人员一道举办过几次会议，这种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提问：作为您研究活动的一部分，请您介绍一下霞山会出版的《近代中国人辞典》的编纂经过及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同时，请您谈谈自己最近正在从事的中国环境研究项目。

山田：《近代中国人辞典》编纂历时近 10 年，由霞山会于 1995 年出版。众所周知，霞山会曾出版过《现代中国人辞典》。已故的江头数马先生希望能再出版一部距今稍早些的《近代中国人辞典》。江头先生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历任《每日新闻》社记者、日本大学教授，并长期担任霞山会的理事长。

最初，霞山会的编辑考虑照《现代中国人辞典》的方式编一部较为简单的。而我不同意，认为应编成一部能够比得上霍华德·布尔曼《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的有特色的辞典。着手编辑之后，由于自己的较真性格，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最初从各类中国近代史通史中选出应该入选的人物 8000 人左右。最终又从这些人物中精选出 1100 人左右。为使各设定项目能够完成，我们向日本学界的许多专家约了稿。

编委会若是过于庞大就会很难统一意见，于是我便和几个关系密切的人组成了编委会。这些人虽然过去是我的学生，但那时都已经成了专家。请执笔者写好后，我至少会过目两遍，而且全部进行了批改。虽然执笔者中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学者，但我还是无所顾忌地让他们的文稿符合自己的设计。为此，到出版为止，花去了很多时间。

与现在不同，当时的霞山会很理解学术工作。会长为近卫通隆先生，理事长为前驻华大

使小川平四郎先生，文化部长由太田久胜先生担任。其中，太田先生更是理解学术问题，始终耐心地等待我们的工作进展。编委会中协助我做工作最多的当属家近亮子（现任敬爱大学教授）。霞山会的小泉美佳在编辑上兢兢业业。这二人一直坚持到最后。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环境的研究。我虽然不是环境问题的专家，但对中华文明的理想状态抱有兴趣。我认为，环境问题属于文明论的组成部分。

1990年前后，在我任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时候，理工科的桥本芳一先生当选了中心的运营委员。桥本先生研究的是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环境问题，将我纳入研究项目之中。这一项目为2~3年。作为后续研究，关心环境问题的三田的经济系、法学系政治学专业，藤泽的综合政策系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的老师也加入进来，成立了中国环境研究会。该组织一直延续至今。

除桥本先生和我之外，还有综合政策系的小岛朋之先生、产业研究所的吉冈完治先生和速见均先生、商学系的樱本光先生以及毕业于庆应义塾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香川顺先生等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人士加入，构成了中国环境研究会的核心。

我们最初实施的是成都市的综合环境调查。然后是生物炭研究，即进行在使用煤球时如何降低硫氧化物（SO_x）的实验。接下来，作为环境研究的一部分，进一步拓展到了植树。一次是在沈阳郊外的康平县种植杨树，另一次是在成都市的熊猫基地为熊猫种植了竹子。这就是最近4、5年实施的项目。

桥本先生认为，环境问题不仅需要大脑思考，而且还必须伴以实践。我们一直基于这一思想开展交流活动。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狭义的环境研究，而是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的理想状态，即探讨中国文明、非常有魅力的课题。

我不是环境领域专家，如今仍在和这些人一道工作，耳濡目染学到好多知识。

提问：接下来，请您谈一谈自己是如何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的。

山田：按照庆应义塾的制度，以系里的3、4年级学生为中心，按照各位老师的选题组成研究会。我的研究会以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史为中心。研究会设立至今已历时30多年，毕业生也超过了300人，都已进入了各自的领域。虽然要求提交论文，但由于是本科生，他们的论文并不一定很专业。我更加注重的是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培养他们分析、创意及表达能力。我希望通过这种锻炼，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庆应义塾的研究生院担负着培养研究人员的重要职责，尤其是博士课程非常重要。我基本上尊重学生自己的选题，因为学生选择课题是自发性的，能够反应其所关心的问题。教师的作用是指导他们如何从事研究。我认为，教师的职责是鼓励他们，为他们提出建议和如何总结。

我指导的学生中，有十多人撰写过博士论文，如今也有一些年轻人正在撰写过程中。研究成果能够以书的形式出版，并得到日本学界的认可是我的基本要求。或许有人认为我的研究会比其他研究会更加严格。但我认为，为使学生能够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社会，这些要求是必需的。因此，接受过我指导的学生们全部出版过著作。

对于留学生，我也实行同样的标准。这对留学生来说非常不容易。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指导过其中4名中国留学生撰写论文。他们全部以书的形式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出版。其中3人以日文出版，1人以中文出版。他们都在日本的大学就职，但后来其中一名叫蔡建国的学生回到中国发展。

接下来讲一些与学生们一道学习的情况。以往的授课大都是由学生做研究报告，然后老师进行点评。后来人们认为这种方式不太适合研究生院的授课。因为学生的报告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他们一直研究的课题，这对学生能力的提高没有什么益处。于是，从某一时期起，

便改为让学生阅读一些与中国政治史直接相关的人写的文章。我也要和大家一起预习，因而很辛苦，但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最早是通读《毛泽东选集》5卷。盐出你读过哪些呢？

盐出（采访者）：我读的是《毛泽东选集》，后来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著作。

山田：那之前曾经读过孙文的著作。后来一直阅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章。读这些文献自己颇为收益。如今这些文献还留在学生们的手中。通过我在阅读时加的标注，学生们可以掌握我的阅读方法。我认为这一方法在研究生院的授课中最为有效。已经毕业的学生如今还在谈到这件事。我在庆应义塾研究生院教学长达30多年，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内采用了这种教学方式。

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们如今分布在日本各大学执教。我认为，这是庆应义塾在研究教育领域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提问：您是如何安排研究资金的呢？

山田：这首先必须谈到现代中国研究需要哪些方面资金的问题。如今日本的COE（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项目等是以拥有资金为前提而设立的。我对这种方式持反对态度。诚然，研究需要资金支持，但必须对哪一方面需要资金进行研究。

依我个人的看法，研究首先需要购买资料和书。目前有大量与中国有关的书籍面世，个人无法全部购买。其次，如果居住在东京一带，如何确保放置书籍的空间需要花费一些资金。如此看来，并不是买书的资金问题，买书和藏书是有限度的。我年轻时曾买过很多书，因为当时的书籍种类很少，只要努力寻找就能买全。如今则不同，书过多，不可能全部购买。

从这一意义上讲，需要充实图书馆。通过互联网选择资料，比过去快捷和便利了许多。但是，在历史研究方面，不能满足于通过互联网获得的资料。发布到网上的资料是已经被发现的资料。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重要的是发现新资料，并据此重新阐释历史事实。

我最近开始着手蒋介石研究，但我所收集的与蒋介石有关的资料无法通过互联网全部查到。当然，互联网的好处是自己不知道的资料能够轻易查到。但我认为，最好不要把这些资料作为研究资料，对其发挥重大作用抱有希望。至少要自己编制文献目录。

我个人的研究所需要的是包括去海外的调研费。由于调研经费不充裕，所以还需向各政府部门提出申请。

开展合作研究项目时，需要会议费、管理费、交流费以及调研费。如若召开国际研讨会，则需要1000万至2000万日元。在日本开展研究活动，需要向文部科学省等国家资金及民间财团提出申请后得到资金。

除中国政治史研究外，环境研究也需要一些资金。种植树木时则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煤球实验时，必须买所需的实验装置及材料。由于其中也含有理科内容，所以需要较多资金。这一项目也使用了国家资金。种植树木等项目则得到了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绿化交流基金的支持。

大学之间也开展合作研究。我参加了于6、7年前启动的庆应大学与中国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中国3E研究。所谓3E，包括“Environment • Economy • Energy”（环境、经济、能源）。这是较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已从日中经济协会、经济产业省、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机构（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等处获得了15亿日元资金。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资金。目前，环境和能源研究相对容易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中国近代史或中国政治研究项目就未必能够有充裕的资金支持。

提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

山田：这与我此前的中国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研究将重点放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社会主义方面看待中国。60至70年代，有人通过文革认为中国出现了新型社会主义。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这一观点被否定。

此前的中国研究及对华看法的问题表现在仅根据当时的动向判断中国，一旦其动向出现变化，看法也随之发生改变。我认为必须从变化着的中国找出某种连续性。历经20世纪50年代、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政治之中必然有其连续性。而且，我认为不应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角度，而应该从20世纪中国整体方面对其连续性问题进行分析。

我认为，中国将来还会发生变化，20世纪末至21世纪，这种变化就在发生。但是，我们为了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必须从理论上对其未变化之前的状态予以确认。对连续性的确认，就是确认其未变化部分，并对未变化部分将如何变化进行分析。这一点是分析未来中国的关键之处。

通过20世纪，我认为中国有三个要素没有变。第一是中国人的同一性，即归属意识；第二是政治上的专政与集权；第三我称之为代行主义。总而言之，这些要素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都属于未变因素。

我发现，中国在这些方面最近也在发生改变。共产党专政仍未发生变化。中国的大方向取决于共产党的政策及其思维方式。但是，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控制的范围有所变窄。

共产党继续维持专政，其权力几乎无法渗透的领域有三。其一是市场经济；其二是互联网；其三是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在这一领域，共产党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控制了。这些领域还在一点点扩大。这也意味着共产党的统治正在逐步受到限制。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与民主化相结合。

自由化正在取得进展，但民主化仍不见踪迹。在自由化方面，与之前相比，人们在社会中的言论、行动变得比较自由。但民主化方面，对政府提反对意见还需要制度化。这一方面仍未取得进展。总之，虽然有了自由化，但民主化方面没有进展。关于是否会出现民主化问题，在遥远的未来暂且不提，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是不会出现的。

我所关注的是2010~2020年这段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000美元左右。届时，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要求将会爆发。如果能够向民主化和平过渡，或是开展关于民主化的和平论争，我认为将会出现在2010年后的20年之内。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今已经意识到届时会发生变化。我的论点在于如何将历史的连续性与变化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提问：最后，想请您谈谈自己是如何看待今后的中国研究的。

山田：虽然无法进行全部的概括性论述，但我目前对蒋介石研究很感兴趣，想从这一方面谈谈中国研究的方向问题。

首先是中华民国史观的横向拓展，其次是连续性的纵向深度的拓展，最后是综合两者所构成的第三视角的相互关联性。我会从这一较大的方向中进行蒋介石研究。

所谓的蒋介石研究，并非是对蒋介石的个人研究，是对中国国民党的研究，进一步从广义上讲，是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首先，将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与其他政治领导人，如毛泽东及其他第三方势力进行比较，进而相对客观地开展分析。这是中华民国史观的横向拓展。其次是连续性的问题，如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之间

的连续性问题。我认为，即使是对中国政治将来如何变化进行分析，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比较的蒋介石研究在中国国民党研究中都是有意义的。从第三点的关联性方面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研究如今正在逐渐接近。蒋介石研究对分析今后的中国政治及中国学术界发生变化的方向性至关重要。同时，也将成为分析日中关系的重要焦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分析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及日中关系时，蒋介石研究都会变得重要起来。我希望能够从探索研究的水平发展、垂直发展及关联性这三个角度，推进蒋介石研究。

还有许多问题，但由于我的能力有限，只能从这几方面考虑我将来的中国研究。

提问：占用了您很长时间，谢谢。